



关注

我和知青的故事

曹谷溪

1965年初,我是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。1968年,知青一来我成了“知青专干”。特别是,曾以“延川县知青工作赴京汇报团秘书长”身份在清华附中、清华园中学、二十中、清河中学和五十七中等七八个中学,向老师、家长和学生作过汇报。到许多知青家里做过家访,学会一句北京话:

“老曹,甭走了,我家有地儿!”

当时政府实行“军管”,团长是个军人,对知青工作不熟悉,所以,我这个“秘书长”就显得特别突出。知青家长对孩子牵肠挂肚的一言一语,都令我心颤。因此,给我留下了一辈子与知青难分难解的“知青情结”。



采访孙立哲小组在关家庄村合影,前排右一为曹谷溪

一

在我当“知青专干”期间,我没有批评过一个知青,对知青生活、学习、劳动,努力关怀。

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公社炊事员。

有人戏说我是“延川县历史上文化水平最高、做饭技术最低的炊事员”(我是延川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的学生)!

这个事,对我当知青专干大有好处。

当年,知青的厨房没有一个是干净的,可以用脏乱两个字概括。

我每到知青点,第一件事就是“套灶火”。紧接着就是组织知青打扫卫生、清洗餐具、晾晒衣物。

贾家坪公社邀家河大队,有知青称我是“曹阿姨”。

我真心和知青交朋友。

知青与知青的家庭出身不同,经历、学历、思想品德、人生追求,各有差别。

我赞赏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中的一句话:“心诚能使石头开花。”

刘马家疙瘩大队有一个知青,插队前没有职业,是一个“小偷”,北京叫“佛爷”。在这行当里凭什么确定地位?

他说:“爷们儿蹲过多少回局子啦!”

以坐禁闭的次数来决定自己在“盗窃”这个行当的位置。我和他交了朋友,他给我坦白这个行当的许多“黑话”。他们把警察称为“雷子”,把上衣兜说成“天窗”,还给我表演了行窃的功夫,用老虎钳子把头号铁丝拧在自己的肚子上,咳嗽一下便能解开……

在他插队后痛改前非,没有作案。后来招工回京。

二

在知青岁月,国家对插队知青的待遇很不错。每人每月45斤粗粮,半斤食油,比当地农民的生活好多了。那个时候,许多农民是粗粮野菜充饥。

就像当年,陕北慷慨接纳了7000名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;今天,又有2.7万多名北京插队知青到陕北插队落户。

陕北人敲锣打鼓,扭着秧歌,烧热土炕,送米酒迎接他们,但是这种热情并不能立即感化所有知识青年。

延川县贾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,有26名北京的知识青年,我给县广播站写了一篇通讯稿《二十六朵葵花向阳开》。稿子还没有广播,25名知青便排队回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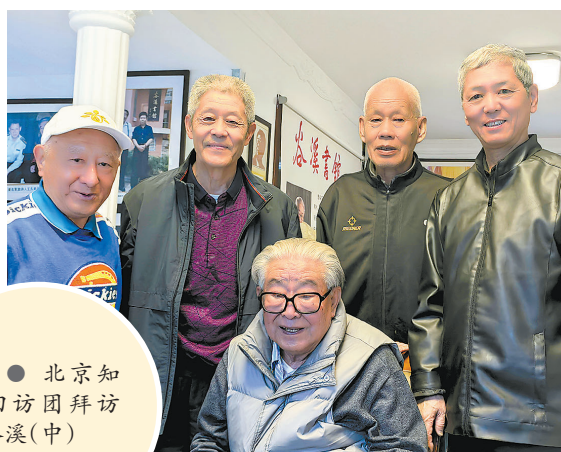
大队干部遭到绥德才劝回来。

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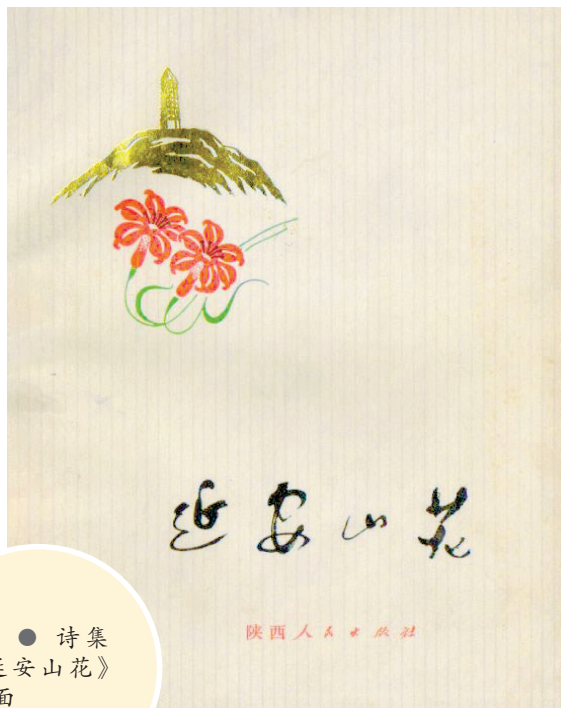
知青的生活比当地农民好一点,可比起北京就差得太远了。不在逢年过节,长时间闻不到肉味,不少社队的知青盗杀老乡的“看门狗”,群众意见很大。

为了阻止这种事情发生,我诬编“吃了狗肉,要变憨憨(傻瓜)哩”!

陕北人真的不吃狗肉,我的“悖论”有了一个很大的传播空间。这样,既没有使知青失面子,又保护了群众的利益。



北京知青回访团拜访曹谷溪(中)



诗集《延安山花》封面



李华、张小建领着他们的外孙女回延安与曹老亲切合影

现在想起来,我对知青的偏护确实有点过分。

他们到陕北不懂得村规乡约。见瓜敢吃,见果敢摘。果子不成熟,便乱摘、乱扔。有一回,林业组长任学义提一筐子青苹果,往我的办公室一扔:“老曹,看你的知青把我队里的果子糟蹋成甚了!”

后来我被县革委会调到革委会通讯组,先是通讯干事,后来当了通讯组长。

也许,当地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插队知青,出了一条“土政策”,插队知青进城办事或外出,必须有公社的证明信,否则就不予接待。

我所主持的革委会通讯组,不论男女,只要穿一件蓝色的“棉猴”,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,通讯组就热情接待,帮助办事。

当时通讯组三个人,就有两个是插队知青。我从公社调到了县革委会,我和知青的接触面更广泛更方便了。

三

当时,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有一位叫孙立哲的知识青年,在设备非常简陋的土窑洞给群众做手术。

卫生局长和一些医务干部署名上诉革委会领导:“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知青,给群众做手术,弄死几个人谁负责!”

听了这话,当时革委会副主任申昂非常紧张,他当即指派我去调查,我说我不懂医学,无法调查。他说给你配一位西安二院的高级外科大夫,做你的顾问,连夜出发。

西安二院的高级外科大夫叫王兴华。

通讯干事石焕南、林达,农村通讯员学习班的学员杨圣敏、解明明和关庄公社知青专干,也加入了考察组。

在细致扎实的调查中,全体人员都对孙立哲做过手术的所有病人做调查。王大夫说,病人的刀口整齐,就是手术成功,如刀口模糊,就是发炎了。经过对孙立哲手术的病人逐一排查,所有手术病人没有一个刀口发炎。

特别是查验一例“腮下腺肿瘤”手术病人后,王大夫激动地说:“这个手术难度较大,如果在领口上面做好操作,可是手术后,会留下一个明显的伤疤,非常难看。若在衣领下切口,衣服一穿就遮盖住了伤疤,可是手术难度较大。”

王兴华当着手术者高兴地说:“这小子真是一个外科大夫的好料!”

不仅排查了手术者,还查阅了孙立哲开的全部处方,用药、计量全部规范。我们向革委会领导做汇报,作出了坚定支持孙立哲的决定。

1971年12月25日,《人民日报》在“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”的标题下,几乎整版刊出《一个活跃在延安山区的赤脚医生——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孙立哲》。

我们考察孙立哲和他的医疗站时,他并不在村上。

后来,孙立哲对我说:“你们的这篇报道,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。那时,我的父亲

被定为‘双料反革命’。那天,我从人民日报社看过这篇报道的清样,往家里走,看见前面走着的一个老人好像我的父亲,我快走几步,果然就是我的父亲。”

父亲含着眼泪对他说:“立哲,好惨呀!”

孙立哲给父亲说,三天后《人民日报》要真名真姓地发表一篇文章,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变。

多年后,孙立哲来延安对我说:“其实这篇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”

这不仅稳定了延川的局势,对北京影响更大。孙立哲父亲的“双料反革命”的帽子摘掉了。

四

知青运动结束了,但我和知青交往没有断,还和许多知青保持联系。

1991年3月12日,我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美华写了一封有趣的信:

美华同志,你好,一别十余年,前几天去延大巧遇高尚斌教授,他说你看到《中流》杂志上的《陕北父老》,并询问我的情况,十分高兴。

中国寄希望于插过队(特别是延安),又上过大学的这一代知识青年。他们对中国与外国,历史与现实,上层与基层了解得非常深刻,而且比其他年龄知识层次的人最少偏见。比他们大的人不行,比他们年轻的人更不行,我以为会有大有作为的。我的这个观点现在不好讲,将来也会有人反对,但是,历史将印证我的这一见解。

在社会转型、时代变迁中,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、民族的希望,是世纪交替的桥梁!

五

为了行文方便,我创造了两个新名词:“前知青时代”和“后知青时代”。

知青返京后,我把我和知青的交往和见闻,都定为“后知青时代”。

1969年2月,延安县(今延安市)下坪公社老牛沟来了11名知识青年落户村里,其中有一个插队知青叫许复强,他一插就是7年。

2000年在中国石油管道买断工龄,窝在家里,插队时的那些人,那些事,折腾得他坐立不安。回陕北一趟,触景生情,情感的野马长时间收刹不住。每每与“老插”们相见或者聚会,总离不开插队那会儿的话题,于是就萌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。

别人是“十月怀胎”,许复强的小说是“怀胎十年”。

40多万言的长篇小说《情感之恩》,中国文联出版社审稿后同意出版,并签订了出版合同。

一个文学新人的长篇小说出版发行,如果没有名家推荐,很难发行。

一篇3000字的序文,在北京哪位大家名家可以请到?就是二三流作家,没有一定的润笔费,也无人可干。

(下转第三版)